

国家图书馆藏元本述略

陈红彦

元统治中华大地不过90年,加上蒙古时期也不足百年,远远少于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宋代。而且由于时代较近,人心免不了贵远贱近,谈起元刻本来,人们也不像说起宋本那么肃然起敬^①。然而元刻本在保护和传播文化遗产方面却功不可没。一则许多重要的典籍有赖元刻接续传承。从校勘意义而言,离文献产生年代越近的刻本,价值越高。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开始盛行,宋刻在文献学和版本学史上的意义毋庸讳言。但是书籍的散佚几乎与书籍的生产同步,宋代翻刻宋版书的现象已经出现,到元代重刻古书一般多源于宋本,有时会增加校勘或增补内容,如元刻《事林广记》,就随时代进展而更新或增补;而宋本一旦不存,元本即为宋本的替身,便是该书最早的版本,如二十六卷本《梦溪笔谈》,最早当推南宋孝宗乾道二年(1166)扬州州学刻本,此本无《补笔谈》和《续笔谈》。每半叶十二行,行十八字。末有“左迪功郎充扬州州学教授汤修年跋”,尾有乾隆甲辰、嘉庆丙辰南昌彭元瑞题识二条。后归汤竹儒,再归桐城萧穆。萧穆又用它和人换了别的书。据说傅增湘在苏州曾见过此书,因残破没有收。此后此书下落不明,很可能已经不存于世了。这样,现存的最早的二十六卷本,就是元成宗铁穆耳大德九年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了。相类似的还有元代刊刻的《诗外传》、《白虎通》、《风俗通》等,元本皆为最早刻本,具有重要的版本意义。

而元刻元人著述更理所当然以该书最早刻本的身份,与宋刻宋人集媲美。如日新堂刻《伯生诗续编》便是虞集诗集最早版本,元至元五年(1339)花溪沈伯玉家塾刻《松雪斋文集》十卷《外集》一卷,也是现存赵孟頫诗文集的最早刻本。其行格疏朗,刻梓精良。明清两代曾经多次翻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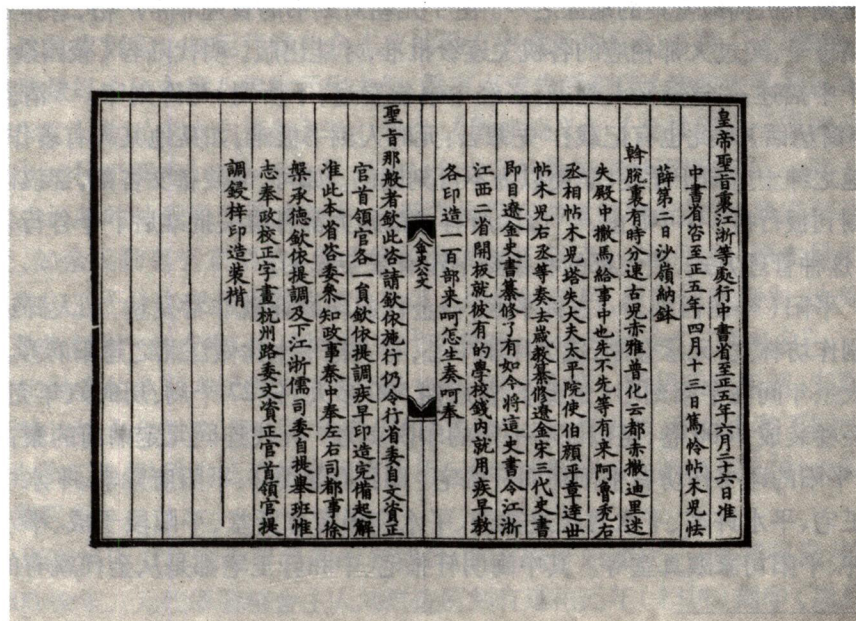
元代建立了严格的刻印书管理体系。作为国家的政务中枢,中书省“典领百官,会决庶务”,直辖的山东西部及整个河北、山西,谓之腹里。而以岭北、辽阳、河南、陕西、四川、甘肃、云南、江浙、江西、湖广、征东11个行中书省,分辖全国185路、33府、359州、1127县,享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指挥权。元朝官方的

^①杨成凯:《元刻本的鉴赏和收藏》上,《紫禁城》2009年第3期。

刻书出版归中书省管,是由当时的这种体制决定的,也反应元朝对刻书的管理制度严格。国家图书馆藏有至正五年(1345)江浙、江西行中书省刻《金史》,书前有给江浙行中书省的牒文(见图),称:“去岁教纂修辽、金、宋三代史书,即目辽、金史纂修了,有如今将这史书,令江浙、江西二省开板,就彼有的学校钱内就用,疾早教各印造一百部来……钦此。”这是由皇上直接下令编纂刻印书籍的情况。至正六年(1346)刻《宋史》四百九十六卷《目录》三卷,书前牒文称:“精选高手人匠就用赍去净稿,依式镂版,不致差讹。所用工物,本省贡土庄钱内应付。如果不敷,不拘是何钱内放支,年终照算。仍禁约合属,毋得因而一概动扰违错。工毕,用上色高纸印造一百部,装潢完备,差官赴都解纳。”将当时官方刻正史的管理方式、制度、刻印用纸、印数、发行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,我们也可由此探究元代刻书制度。以版本重要著称的九路刻正史,则更是对刻书管理制度有明确的阐释。私家刻书在遵从政府的制度外,使尽浑身解数扩大影响,如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九经三传,以及元至正九年(1349)俞氏读易楼刻公文纸印本宋俞琰撰《周易集说》等,校勘质量高,刻梓精良,成为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版本。

此外,元刻本以其厚实浓重的墨色和圆活流动的行笔,在印刷史上作出了新的探索,建立了特色分明的元刻风格。

总之,元刻承上启下,既传承宋本,同时又给明清重印古籍提供丰厚的资源,形成一个时代独有的风格,值得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和重视。国家图书馆以丰富的元刻收藏,很好地诠释了元本的特点。



元刻本《金史》

一、国家图书馆元本收藏概况

根据钱大昕《补元史艺文志》统计,元代刻印、流通的图书,经部为 804 种,史部为 477 种,子部为 763 种,集部为 1098 种,共 3142 种。其中应有一部分为元代刊刻者。对于前后历史不足百年的元朝,有如此多的书传播在社会上,可谓盛况可观了。我们根据 1996 年出版的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做了粗略的统计,现存古籍中,元刻经部 231 款,史部 211 款,子部 205 款,集部 231 款,总 878 款,去除副本的因素,约 570 款左右,占流通总量的 18% 左右。从绝对数量上少于存世宋刻。其实在明清藏书家手中,大多元本数量便不及宋本。

二、国家图书馆藏元本特点

1. 元刻数量大、种类多,藏品涵盖刻书地、刻书机构较为全面

国图藏元刻本数量为 700 余部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之元本,国家图书馆所藏占总数的近 80%,占大陆现存元本之太半。不论刻书地还是刻书责任者均种类齐全,成为今人研究元代出版史、编撰史和收藏史的重要依据。

元代刻书的地域,北方主要以大都为中心,另外承袭金代刻书传统,平水也是北方的刻书中心之一。南方以杭州最为兴盛,福州地区则承袭两宋之遗,一些著名书坊仍在继续。几大刻书地的刻本,国家图书馆均有实物留存。

元定都大都(今北京),元代中央的刻书机构,实际上也就是设在大都的刻书机构。元朝中央级的刻书机构中,秘书监的兴文署、艺文监的广成局、太使院的印历局、太医院的广惠局或医院提举司等比较有名。所以大都在元代可以说是刻书机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。由于元朝对刻书的管理非常严格,著作要由本路进呈,经过大都相应的各机关逐级批准,才能出版。明代陆容《菽园杂记》卷十中描述:“尝爱元人刻书,必经中书省看过,下所司,乃许刻印。”清蔡澄《鸡窗丛话》对此也有记载:“先辈云:元时人刻书极难,如某地某人有著作,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,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。如可,学使备文咨部,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,不可则止。”^①因为所有书都经大都各机关批准后下令各行省刻印,这种管理方式,使大都的私家刻书没有繁荣起来。

平阳(今山西临汾)古称平水,自金代起印刷业就非常发达,私人开设的印刷作坊林立,元承金制,成为印刷中心,有人把平水比做江北之建阳麻沙。蒙古太宗年间在平阳刻印《道藏》,曾雇佣 500 多人,分 27 个局,历时八年完成,其经卷装成 7800 卷,足以证明平阳的印刷实力。元代连同元定鼎前的蒙古时期,平阳的印书作坊有平阳晦明轩张宅(即张存惠堂)、平阳府梁宅、平水中和轩王宅、平水许宅、平水曹氏进德斋、平水高昂霄尊贤堂、平阳段子成、平水刘敏仲、平阳司家颐真堂等。其中晦明轩张宅、中和轩王宅都是从金代就有的老

^①转引自《书林清话》卷七。

字号。晦明轩张宅,店主张存惠,字魏卿,他的书坊在金代就刻了不少书,入元后继续从事刻书业,仍然用金代的年号,因此他刻的书常常被误认为是金刻本。他所刻《增节标目音注精义资治通鉴》、《重修政和证类本草》三十卷、《经史证类大观本草》三十卷等,国家图书馆均有收藏。曹氏进德斋刻印过巾箱本《尔雅郭注》、《中州集》、《中州乐府》等,平阳段子成中统二年刻《史记集解》,刘敏仲的《尚书注疏》等,都是印刷史上非常著名的刻本。平水本的印刷质量,赵万里先生评价:字画刚劲,纸墨精莹,刀法遒劲,达到当时刻版印刷的最高峰。

元代南方的雕版中心,仍属杭州和建阳两大地区。元代杭州刻书盛况,比之宋代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里不但汇集着一大批技艺精湛的刻工,而且盛产优质的纸张和印墨,再加上当地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以及水陆交通的便利,为印刷业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。虽然在元灭宋的战争中,杭州的印刷业遭到一些破坏,但是主要是印版的散失,生产力并没有多大的损失,进入元朝之后,杭州的印刷业仍然居全国之首。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刻书,如《文献通考》、《大德重校圣济总录》、《农桑辑要》、《大学衍义》等,都拿到杭州组织刻印。在杭州雕版的最大工程,当属至正五年起陆续雕印的辽、金、宋三史。元刻精品《元一统志》、《五服图解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、《六书统》等,也都是在杭州雕印的。

福建刻书业在元代仍在全国领先,福建刻书业又以坊刻为主,以建阳为最盛。建阳书坊云集,有资料可考的就有40馀家。一些刻书大族自宋入元,仍操旧业。其中最有名的有余氏勤有堂、刘氏日新堂、虞氏务本堂、郑氏宗文堂、叶氏广勤堂、刘氏南涧书堂、刘氏翠岩精舍等,都历史悠久。现存的元代坊刻本也多为这几家刻印。如元代崇化余志安的勤有书堂所刻印的书籍,不仅数量多,而且质量好。从大德八年到元代末年,勤有书堂先后刻印《增注太平惠民和济局方》三十卷、《李太白诗集》二十五卷、《唐律疏义》、《李杜诗》、《国朝名臣事略》、《杜工部诗》二十五卷等。元末,余志安的勤有书堂逐渐衰落,一些书版被继之而起的叶日增广勤堂购去,广勤堂将勤有书堂的牌记改掉,换成自己的牌记,如余氏勤有书堂刻的《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》二十五卷,原本目录后有“皇庆壬子余志安刊于勤有堂”木记。版归叶氏后,原牌记被剗去,改刻为“广勤堂新刊”鼎式牌记。到他的后代叶景逵,书坊改名为“三峰书舍”,于是又将广勤堂的鼎形木记改刻为“三峰书舍”钟式木印。明代正统年间,书版被叶氏转让给金台汪谅,牌记又换成“汪谅重刻”。一套书版,印出5种不同的版本,非常有趣。叶氏自己刻的书仅有天历三年的《新刊王氏脉经》和《针灸资生经》等医书。

再有刘氏书坊中最有名的翠岩精舍,从南宋开始建立,一直到明代,持续了200馀年。元代翠岩精舍主人刘君佐所刻有延祐元年(1314)刻印《周易正义》十卷、《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》二十四卷,泰定四年(1327)刻印《朱子诗

集传附录纂疏》二十卷、《三家诗考》六卷,天历元年(1328)《新刊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》三卷,天历二年(1329)刻印《新编古赋解题》十八卷,至正十四年(1354)《书集传辑录纂注》六卷、《注陆宣公奏议》十五卷,至正十六年(1356)《广韵》五卷,还有《国朝文类》七十卷目录三卷,《渔隐丛话前集》六十卷等。

翠岩精舍刻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刻于至正十六年(1356)的《广韵》五卷,书的刻版和印刷都非常精美,封面版式已经突破了以往的格局,不但有书名、出版印刷者、印刷年代,而且有宣传性的内容,版面对称严谨,字体大小、布局十分讲究,在正文中还采用了反白字,使版面看起来非常活跃。

福建有名的书坊还有虞氏务本堂,务本堂主人名虞平斋,他刻印的书籍有《赵子昂诗集》、《周易程朱传义》、《新编四书待问》等。

除了上述刻书中心以外,元代的印刷业还分布在全国很多地区,新疆、西藏等地处偏远的地区都有分布。最发达的还是人文荟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,今天的浙江、江苏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福建等地分布非常广泛。较有名的如平江路(今苏州)天心桥南的刘氏梅溪书院,元代刻有《郑所南先生文集》、《清雋集》等;茶陵(今湖南)东山书院刻有《增补六臣注文选》、《梦溪笔谈》、《文选补遗》、《尹文子》等;庐陵(今江西)胡氏古林书堂刻有《黄帝内经素问》、《黄帝灵枢经》、《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等;庐陵武溪书院刻有《古今事文类聚》二百二十一卷,庐陵泰宇书堂刻有《草堂诗余》等;今浙江有婺州三衢石林叶敦所刻《冷斋夜话》,括苍曾南阜书堂刻《东坡乐府》;在福建有潘屏山积庆堂(圭山书院)所刻《杜工部诗集》二十五卷,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所刻《杜工部诗史》,熊禾武夷书堂所刻《易学启蒙通释》二卷。

实际上,元代的私宅坊肆刻书比我们上面列举的要多得多。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《元朝私刻本表》列出私宅、坊肆有118家,刻印图书232种。这个统计对于丰富的元代私雕、坊刻来说,也是远远不够的。

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中涉及的刻书机构也非常丰富。元朝官刻的书籍,除了中央的刻书机构外,最主要的当属由各机关辗转下达给各路儒学、书院、郡庠、郡学、儒司刻印的书籍。这些地方政府、学校、书院的刻书活动在元代十分活跃,所刻精品为多,特别是书院刻书,是元刻的一个突出的特色。

书院,始于唐朝,经唐末五代,兴于宋朝,盛于元朝,明清两朝继续发展。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机构,书院对中国古代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过重要影响,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也独具特色。中国历史上的书院既是教育机关,又是学术研究机构,著名的书院往往又是一个学派的学术研究和传播基地,有其学术和学风上的特色。重视“讲明义理”的学术争辩和学术交流,允许不同学派讲学,体现学术自由的精神,阐扬思想,针砭时弊,是书院的特点。

由于书院与教育直接相关,所以也比较自然地成为历代不可忽视的刻书机构。书院刻书,宋代已经非常兴盛,所刻之书,校勘比较精审,多可称为善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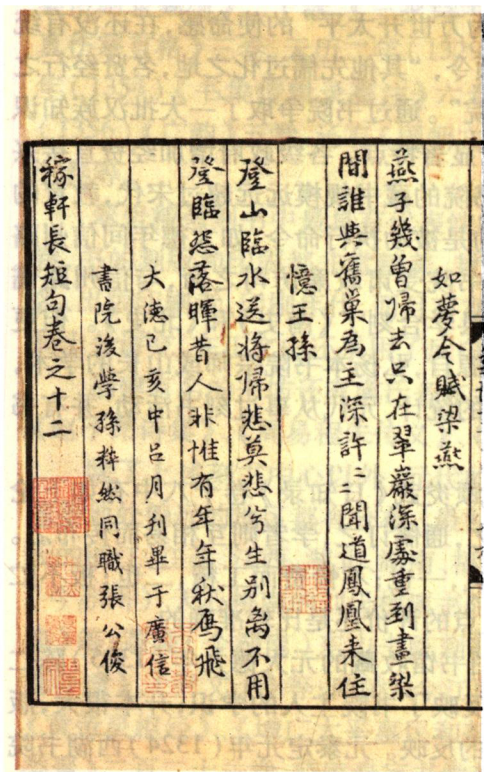
宋元之交,士人们带着“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使命感,在还没有统一全国的时候就开始建书院。元统治者颁令,“其他先儒过化之地,名贤经行之所,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,并立为书院”。通过书院争取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。书院的官学化,是元代书院的一个显著特点。各级政府增加经费直接兴办书院,使书院的管理更加稳定。元代书院的藏书规模远远超过宋代,教育的职责之外,也大规模刻书。书院刻书有的是被动执行命令,如大德年间信州路的象山书院、道一书院、稼轩书院、蓝山书院受肃政廉访司之命,与信州路儒学、玉山县学、弋阳县学、贵溪县学、上饶县学合刻了《南史》和《北史》。但更多的书院刻书是为了表明本书院的学术源自,弘扬本书院宗师或山长的学术,满足书院教学和研究的需要。根据今人的统计,元代从事过刻书活动,并有书籍流传下来的书院约 50 家^①。

元代书院刻书受到后世重视,清代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十八中有如下论述:“闻之宋元刻书,皆在书院。山长主之,通儒订之,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。故书院刻书有三善:山长无事而精于校仇,一也;不惜费而工精,二也;板不贮官而易于印行,三也。”其对书院刻书优点的评价还是比较准确的。

元代书院刻书留下的精品,如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元大德九年(1305)陈仁子东山书院刻《梦溪笔谈》,校勘极精,反映了书院主人的学识;开本很大,版心很小,别具风格,就是书院的经济实力的反映。元泰定元年(1324)西湖书院刻本《文献通考》,为中书省奉诏命江浙行省缮写雕版印刷,至泰定元年西湖书院最早印行的。该书版心宽阔,字体于圆润中不失俊朗,颇寓宋刻遗风,刻印俱佳,可以说是元本的代表作。西湖书院是在南宋国子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,有较多的田产,规模大、存书版也多,成为其刻书、印书的有利条件。除《文献通考》外,西湖书院还刻印过苏天爵的《国朝文类》(至正二年)、岳珂的《金陀粹编》(至正二十三年)、程文的《蚊雷小稿》、《师意集》、《黟南生集》等。

再如辛弃疾的词集《稼轩长短句》,约成书于开禧三年(1207),辛弃疾辞世之后,自宋代起就有多种版本流行。传至现今的版本主要有两个系统,一是四卷本,一是十二卷本。四卷本基本上保持了宋本的原貌,有较高的文献价值,但收词比十二卷本几乎少了三分之一。国家图书馆藏元大德三年(1299)铅山广信书院刊本《稼轩长短句》为十二卷,共辑录辛弃疾词五百七十三首,系传世孤本,卷十二后有“大德己亥中吕月刊毕于广信书院,后学孙粹然、同职张公俊”两行(图见下页)。辛弃疾南渡后,居铅山、上饶两地时间最久,并于开禧三年卒于铅山。所以此处所说的广信书院,疑即铅山稼轩书院。此书卷一第一叶版心下镌“信铅畅叔仁刊”。信铅为信州铅山县之简称,铅山、上饶宋时均属信州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有“稼轩词四卷,又信州本十二卷”。宋代信州本不传,此广信书院刻本,疑为覆刻宋信州本。此书采用行书写刻上版,笔墨飞舞,

^①徐梓:《元代书院研究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0年。



元刻本《稼軒長短句》

字画圆润秀丽,疏朗悦目,独树一帜,是元代刻书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,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。

此外国家图书馆藏大德六年(1302)宗文书院刻印的《经史证类大观本草》三十一卷、《五代史记》七十四卷,泰定元年(1324)西湖书院刻印的《文献通考》三百四十八卷,元统二年(1334)梅溪书院刻印的《韵府群玉》二十卷、《皇元风雅》三十卷,至正十一年(1351)建安书院刻印的《蜀汉本末》三卷,二十六年南山书院刻印的《广韵》五卷,雪窗书院刻印的《尔雅注》三卷等,从校勘质量、书写上字、雕刻刀法、印纸墨色都令人称道,是元代雕版印刷技术先进水平的代表之作。

2. 孤本量大、名刻居多

笔者根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统计,所著录元刻本中,仅国家图书馆一家收藏的有183部。尽管2007年以来

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古籍普查,宋元刻本均有新的发现,但仍未打破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中孤本多的格局。

国家图书馆藏元本中不乏学界普遍关注、存在争议的版本。如版刻史上的悬案——宜兴岳氏刻本《九经三传》，明末以来被定为岳飞的孙子宋岳珂刊刻，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卷一著录《春秋经传集解》四函三十二册，提要称“诸卷末有木记，曰‘相台岳氏刻梓家塾’，或曰‘相台岳氏刻于荆谿家塾’。为长方、椭圆、亚字诸式。具大小篆隶文。盖南宋岳珂，乃飞孙，本相州汤阴人，故以相台表望。南渡后，徙常州。今宜兴有珂父霖墓，故家塾以荆谿名”。明确认定《春秋经传集解》是岳珂刊刻的。张政烺先生以翔实的证据认定刊刻者为岳飞的九世孙元人岳浚，与岳珂无关^①，解决了历史上一段悬案。岳氏荆谿家塾刻《九经三传》，现存《周易》、《周礼》、《春秋经传集解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，均藏国图。各书在流传过程中历经聚散离合。其中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写刻俱精，有周叔弢先生跋；《孝经》一卷为周叔弢先生旧藏，他在收得此书欣喜若狂，专门治“孝经一卷人家”印；《周易》九卷历经明周天球、袁枢、民国涵芬楼等名家收藏；《论语集解》十卷、《孟子》十四卷经明朱锺铉晋府、清季振宜、

^①《读〈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〉》，《张政烺文史论集》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。

徐乾学、清宫天禄琳琅等官私收藏。

再如九路儒学刻十七史。江东建康道包括宁国路、徽州路、饶州路、集庆路、太平路、池州路、信州路、广德路、铅山州。大德九年(1305),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副使伯都,以为“经史为学校之本,不可一日无之,板籍散在四方,学者病焉。浙西十一经有全板,独十七史未也。职居风宪,所当勉励”。由于伯都的提倡,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亦以“十七史书艰得善本,从太平路学官之请,遍牒九路,令本路以《西汉书》率先,俾诸路咸取而式之,置局于尊经阁,致工于武林。三复对读者,耆儒姚和中辈十有五人,重校修补者,学正蔡泰亨。版用二千七百七十五面,工费俱载学记,兹不重出。始大德乙巳仲夏六日,终是岁十有二月二十四日,太平路儒学教授曲阜孔文声谨书,承务郎太平路总管府判官刘遵督工,中顺大夫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副使伯都提调”^①。据此,十七史应该是由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组织九路联合刻印的。原藏于内阁大库,现藏国家图书馆的元大德九年宁国路儒学刻本《后汉书》中,有云谦跋称:江东宪副伯使公语谦曰:“浙西十一经已有全版,独十七史则未也,今文移有司董其役,庶几有成。”谦应曰:“此盛举也。”于是宛陵郡学分刊《后汉书》,自大德乙巳孟夏刻梓,至仲冬书成,版计二千二百四十有奇,字计一百二十餘万,郡侯谨斋夏公力赞其成。该书装帧形式保留着原来的蝴蝶装,元刻元印,十分难得。在太平路和宁国路的带领下,大德九年建康路儒学刻有《新唐书》225卷、《晋书》130卷、《新五代史》74卷,饶州路刻有《隋书》85卷,大德十年(1306)池州路刻有《三国志》65卷,信州路刻有《北史》100卷、《南史》80卷。这样江东道所辖八路加上铅山州,共刻成十史,其馀则未付梓。现国家图书馆藏有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北史》五种。至于各路内是如何分工刻史的,由于文献无证,已不得而知。而元大德饶州路儒学刻明正德十年重修本《隋书》,书口有“尧学”、“番泮”、“饶州学”、“乐平”、“浮学”、“初庵学院”等字样,当时,饶州、鄱阳、乐平、浮学都属于饶州路。元大德信州路儒学刻《北史》版心上镌刻版机构有信州路儒学、信州路象山书院、稼轩书院、蓝山书院、上饶县学、玉山县学、弋阳县学、贵溪县学、永丰儒学等。上饶、玉山、弋阳、贵溪、永丰五县,元时俱属信州路。则这些镌刻在版心上的信息,将为我们研究刻书过程中的分工情况提供第一手的资料。

学术界还存在着一一种说法,就是元谢应芳《龟巢集》卷十三中有《募朋友置十七史疏》,文中记载:“命甥女婿周朋举诣集庆路干托士友陈云心买纸,儒学内印制,共作四百六十册,所用装潢、作料、工直等费,计二百贯,澹泊斋藏贮诸史,时至元五年岁在己卯,余在鸣凤王氏家塾。”由这段记载可知,谢应芳藏十七史应该是后至元五年(1339)在集庆路儒学印造的。但集庆路儒学按分工只刻《新唐书》,何故出现十七史?据分析有两种可能,第一,可能是集庆路地

^①孔文声:《汉书跋》,元大德九年太平路儒学刻本,国家图书馆藏。

处交通要道,九路史刻印完成后,将所有版片都集中在此地,以便过往学者刷印流传,如元张铉《至正金陵新志》著录,集庆路儒学有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隋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诸史的版片。可见版片后来集中于此,供学者刷印是完全可能的;第二,集庆路儒学在九路汇刻诸史 30 余年之后,后至元五年之前将十七史重刻行世。但不管是那一种情况,十七史都已经刻齐了。九路儒学和十七史还有一些疑问,值得我们去探究。

3. 传承有绪,公藏、名家收藏居多,收藏富于传奇色彩

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元刻本上多有前代藏家的藏印、题跋,由此可以了解藏书主要来源。就官藏而言,有元明清三代内府旧藏,部分钤有元国子监崇文阁、文渊阁、大本堂、东宫书府、天禄琳琅等印章;来自清内阁大库的百馀部中,大多为直接划拨而来,也有从内阁大库散出后经藏书家收藏又归入国图的。没有钤印的收藏,大多有明确的档案记载,应该说是传承有绪,来源清晰。就名家旧藏而言,经晋府收藏者 20 部,毛晋汲古阁旧藏 35 部,黄丕烈收藏或题跋者 38 部,汪士钟旧藏 68 部,铁琴铜剑楼旧藏 140 部,张元济涵芬楼旧藏 86 部,周叔弢藏过者 32 部,傅增湘 18 部,陈清华藏过者 5 部,可见国家图书馆元刻收藏多传承有绪。

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收藏史上还有很多故事。

如宋词双壁辛弃疾《稼轩长短句》和苏轼《东坡乐府》的聚散。清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曾从骨董铺中获元刻《稼轩长短句》,称绝无仅有之宝物,倍加珍视。后无力购书,遇宋元刻又不忍释手,常典质借贷以购。听闻黄丕烈欲卖词换书,顾千里反而力劝其购入一部元刻词集。黄跋记录二人对话,“余曰,此必宋刻矣。千里曰,非宋刻,却胜于宋刻”。面对卅金之价,黄丕烈毅然检书一二种售与友人,得银廿四两,益以日本刻《简斋集》,凑得卅金。所换来者乃是元延祐七年(1320)叶辰南阜书堂刻本《东坡乐府》,加上原藏士礼居的元大德三年(1299)广信书院刻本《稼轩长短句》,遂使黄丕烈将两位大词人的最佳刻本合成双壁,也是书林的一段佳话。其后两书从黄丕烈家散出后,又到汪士钟艺芸书舍,后归至杨氏海源阁。海源阁书散后,被周叔弢先生购得,在解放后捐赠给国家图书馆,让这两部珍贵的古籍找到一个好的归宿。

再如梅花双璧。《梅花字字香》为元郭豫亨集古人咏梅诗句而成的一部咏梅诗集。书名也是取宋晏殊词“唱得红梅字字香”句。此书刊刻风格还有宋刻遗韵,行格疏朗,字画古劲,“亦如梅之老干虬枝,亚影疏窗,殊可爱也”^①,为元刻中之上乘之作。此书原藏清圣祖玄烨第二十二子允祥府邸怡府,后入明善堂。从清宗室散出之后,为山东聊城海源阁所得,成为海源阁的秘籍。《楹书隅录》卷五著录此书,称:“近时胡君珽得五砚楼袁氏钞本,刻入琳琅秘室丛书。

^①钱曾:《读书敏求记》。

其跋云:遵王所藏元刻已归内府,世少传本,此本为怡邸旧物,即至大原刊。纸墨古雅,信遵王所评不虚也。胡刻舛误颇多,……非见此原刊,几无从是正矣。前集诗五十首,后集诗四十八首,豫亨序言百首,盖举成数。……余藏韦珪《梅花百咏》亦元刊,与此恰堪璧合,皆仅见之书也。”话语之中洋溢着自得的意味。海源阁衰落后,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对其收藏的珍贵秘籍极为关注,直至1934年12月,周叔弢终于将海源阁收藏的《梅花百咏》、《梅花字字香》收入囊中,成就心愿。1952年,周叔弢将双璧捐赠国图。

三、国家图书馆藏元本的特点及价值

1. 全面的收藏,为研究元代印刷史、出版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

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元代刻书,数量大、种类多,不同刻书地、刻书机构几乎均有保存,为元代印刷史、出版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材料。如上文已经提及,中央经中书省札付礼部下各路儒学刻书的制度,通过元代官刻的宋、辽、金三史可略见一斑。

元代由各道肃政廉访司发起下各路儒学刻书的方式,也在藏书中有全面反映。使用这种方式最著名的就是上文提到的大德九路儒学刻印十七史。此外还有后至元五年(1339),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根据本道廉访使苏嘉的呈请,移文扬州路总管府,照行本路儒学刻印马祖常的《石田先生文集》十五卷;至正二十五年(1365),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据平江路守镇分司牒请,下平江路儒学,刻印鲍彪注《战国策》十卷等。

其余各路儒学,或自有著述文字,经本路儒学提举司考校,或因山长崇信某书,由各路儒学刻印的,更是不胜枚举。如大德九年(1296)无锡州学刻印的《白虎通德论》十卷,大德三山郡庠刻印的《通志》二百卷,至正四年(1344)集庆路儒学、溧阳州学、溧水州学合资刻印的《金陵新志》十五卷,至正二十三年(1363)吴郡庠刻印的《通鉴总类》二十卷等,都是非常有名的元代儒学刻本。元代官刻书,从各个渠道最后都落在儒学付梓印行,既是管理体制决定的,也是元朝儒学具有经济条件的具体反映。

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元措所编《孔氏祖庭广记》,成书于金正大四年(1227),并镌版于金都南京(今河南开封)。书中保存了大量阙里文献,前人目录中也罕有著录,是研究孔子和曲阜史地的珍贵资料;两汉以来孔氏庙林碑刻,旧书只录碑目,此书则尽载旧碑全文,可补诸家碑录之阙。该书初版久失,蒙古壬寅(1242)耶律楚材奏准皇帝,令孔元措赴阙里奉祀,元措归阙里后,即增补校正,重雕此书。当时蒙古未建年号,以干支纪岁。传世的蒙古刻本极为罕见,国图收藏仅11部而已。此本则代表了蒙古时期雕版印刷的水平,纸墨古雅,字划精美,是金元时期雕版印书的上品。见多识广的黄丕烈在《孔氏祖庭广记》的跋语中称之为“惊人秘籍”,钱大昕称“予所见金元刊本,未有若是之完美者”。

国图历经百年收藏,特别是1949年以来,公私藏家几代收藏如百川归海入

藏国图,使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丰富的印刷史、出版史史料,也是研究者的幸运。

2. 研究辽金元历史文化最早的资料

契丹虽然有文字,但只是注音拼音,流行在民间,用来著书的并不多;且辽代有禁书令,有关辽国史事的书很少能流入中原,因此可以流传到今天的辽国史料就更加罕见。《辽史》一百六十卷,历时十一个月修成,是二十四史中成书最快的一部。成书仓促,内容缺略,而至正本又已不存,我们只能从现存的至正江浙行中书省所刻《宋史》、《金史》中寻找同时修撰刊刻《辽史》的记载,故现存《辽史》的明南北监本和道光殿本成为辽代史料的遗存。而《契丹国志》,又称《契丹志》、《辽志》,成书于元朝初年,全书共二十七卷。该书是除了元修《辽史》之外,现仅存的纪传体辽史,共记载了辽代218年的史事,几乎囊括了有关辽的重要史料,对研究辽代历史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。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部元刻本《契丹国志》,是现存最早的版本,也是研究辽史最珍贵的一手史料。

元代国祚短促,文化艺术相对于其他朝代不甚发达。不过也有号称儒林四杰的虞集、柳贯、黄潜、揭傒斯,并称元诗四大家的虞集、杨载、范梈、揭傒斯等人物出现,还有著名画家、楷书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。元后至元六年(1340)刘氏日新堂刻《揭曼硕诗集》三卷,是揭诗最古的版本;又刻虞集诗集《伯生诗续编》三卷,在虞诗中亦为最古之本。赵孟頫的集子则以后至元五年(1339)花溪沈伯玉家塾刻《松雪斋文集》十卷《外集》一卷本流行最广,也是现存赵氏诗文集的最早刻本,行格疏朗,刻梓精良,极为精致。后至元七年(1341)建安虞氏务本堂刻《赵子昂诗集》七卷,与沈伯玉家塾刻本多有异同,诗也多出了数十首,为最古之别本,极为罕见。

元曲、杂剧是元代文学创作中最辉煌的成就,大量通俗文艺书如平话小说、杂剧、戏文等都刻印流传过,只是由于时间的久远,很多书籍没有能流传下来。元杂剧作品集《古今杂剧三十种》三十卷之元刻本为现存最早刊本,所收元杂剧有关汉卿、高文秀、郑廷玉、马致远、武汉臣、尚仲贤、纪君祥、石君宝、张国宾、孟汉卿、王伯成、岳伯川、狄君厚、孔文卿、杨梓、宫天挺、郑光祖、金仁杰、范康、无名氏的作品。从内容上看,既有历史剧,如《西蜀梦》、《单刀会》、《气英布》、《赵氏孤儿》、《夜追韩信》、《博望烧屯》;又有爱情剧,如《拜月亭》、《调风月》;谴责剧,如《冤家债主》;宣扬王权天授的,如《陈抟高卧》;宣扬禁欲的,如《三度任风子》;反映王位之争的,如《三夺槊》;还有传说故事,如《火烧介子推》、《铁拐李还魂》等等。由于刻印年代久远,书中误字、漫漶、变形、残损、空缺、墨丁、脱漏、衍文、倒错较多,阅读不便。但作为最早刻本,该书对于考察元杂剧的演变、发展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。根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此书元刻本仅国家图书馆有藏。

《朝野新声太平乐府》九卷,亦称《太平乐府》,是元代散曲集。元杨朝英辑。杨朝英生平事迹不详,仅知道他曾经和贯云石交游。该书编选于至正年间,选录了关汉卿、马致远、钟嗣成等八十馀家作品,按宫调顺序编排。元人散曲编成

专集的非常少,而除本书外,杨朝英还曾选辑《乐府新编阳春白雪》,合称“杨氏二选”,是元人散曲得以保存至今的最重要的两个选本,更是治曲者不可缺少的两部重要资料书。元刻本《朝野新声太平乐府》传世二帙,一为朱彝尊旧藏本,存前八卷,国家图书馆藏。另一部为毛氏汲古阁旧藏,今藏上海图书馆。

3. 承上启下,传承文明

一些古籍宋刻散佚,假元本得以传承。如《梦溪笔谈》,是北宋沈括撰写的一部笔记著作,共二十六卷,另有《补笔谈》三卷,《续笔谈》一卷。《梦溪笔谈》内容有故事、辩正、乐律、象数、人事、官政、权智、艺文、书画、技艺、器用、神奇、异事、谬误、讥谑、杂志、药议等十七类,总结了作者多年来对科学技术、历史、考古、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,保存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。书中还记录了许多当时劳动人民在工业、工程上的杰出发明,如布衣毕升创造的活字印刷技术、有关中世纪指南针的装置方法、喻皓的建筑技术、陕北鄜延境内的石油等等,史料价值极高。《笔谈》一书宋代有扬州刻本,乾道二年又重刻行世。宋刻今不传,现存以国家图书馆藏元大德九年(1305)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为最古。陈仁子刻本二十六卷全,前有乾道二年扬州州学汤修年跋,可知据乾道本重刻,成为宋本的接续。同时此书开本很大,天头地脚极宽,而版框却很小,在版式安排上极为特殊,装帧形式则保留了元时的蝴蝶装,也使此书独具特色。刻印刀法娴熟,初印精美,令人叹为观止。文献价值、文物价值、艺术价值俱备,使这件《梦溪笔谈》的版本价值就显得非常特殊。

元本在传承宋本的同时,一些刻本作为该书最早刊本流传于世,一些则为明清再次刊刻留下了可资信任的底本。《元丰类稿》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诗文集,成书于北宋年间,宋代已经有刻本。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有《元丰类稿》五十卷,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著录有《元丰类稿》五十卷《续元丰类稿》四十卷。元季兵燹,唯有《元丰类稿》五十卷留传下来。而流传至今最早最完整的刻本是元大德八年(1304)东平丁思敬刻本。此本纸质细润,版式宽大,字画精整,尤其是校勘精审,是元刻本中的精品。可惜此本并不多见,明代藏于内閣,连士大夫也很难见到。正统十二年(1447),宜兴县令邹旦从赵琬处得到《元丰类稿》的抄本,又设法从其他途径见到官本,彼此参校,刻印成书,是最早的明刻本,卷后有大德八年丁氏后序,可知应源于元大德本。明成化八年(1472),南丰县令杨参取宜兴本重刻成书,虽错讹较多,但在明代曾多次修版补刻,印刷量大,对后代的影响也大,自此《元丰类稿》才开始广为流传。而元刻本则是明清诸本之源,且与明清诸本相比,更能够反映曾巩著作的原貌。

4. 特点突出,异彩纷呈

在版本学史的专门论述中,述及元代刻书一般总结为以下几个特点:黑口、赵体、无讳、多简^①。

^①李致忠:《历代刻书考述》,1989年,巴蜀书社。

元刻多为黑口,或为当时经济比较拮据,或为刻工追求速度所致。但也有不少白口,特别是元代初年南方刻印的书籍,因为主持刻书者由宋入元,习惯使然。

对于元刻本的字体,一般认为“元刻书多用赵松雪体字”^①。实际上,元代初年刻书的字体仍承袭了宋代的风范,多用颜体、欧体、柳体,这在政府刻印的书籍中就更为明显。中后期刻书字体渐渐倾向使用赵体,但还有一种例外,就是请当时的书法名家写刻上版,于是刻本就带有书家独有的艺术风格。如至正二十六年(1366)刻《渊颖吴先生集》就是由当时著名书法家宋璠书写的。此本为初刻,字体古雅,尤足珍贵。明嘉靖元年(1522),祝鸾曾据此本重新翻刻,但翻刻不佳。再如元刊本《茅山志》十五卷,原本为张雨所书。张雨(1277-1348),字伯雨,号句曲外史,钱塘(今浙江杭州)人。年二十馀弃家为道士,道名嗣真,道号贞居子。博学多闻,善谈名理。诗文、书法、绘画皆工,风格清虚雅逸,有晋、唐遗意。书法初学赵孟頫,后师李邕、怀素等。张雨写样上版的《茅山志》,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其手迹。后至元六年(1340)刊刻《伯生诗续编》则采用了手写体草书写版的方式。还有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周伯琦的《六书正讹》,就是著者亲自写版的。还有一种行书写体,活泼流利,是元代印刷字体的创新,其中大德三年(1300)广信书院刊刻的辛弃疾的《稼轩长短句》即是这种行书写刻上版。上文所及《梅花字字香》、《梅花百咏》也都是写刻,字体稚拙,特点明显。

基本不行避讳也是元刻的另一个显著特征。避讳在中国前后二千馀年,但在元朝,蒙文译音不再是汉字的原始意义,元代便只有讳法,而无讳例。加上元代人的礼制观念薄弱,查禁不严格,所以在元代刻书中几乎见不到避讳的痕迹。

元刻书中更多地使用简体字和俗字也是特点。汉字使用从规律上讲,历来都是删繁就简,况且简体字刻起来也比繁体字简单得多,省事得多,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,书铺图快,书手图简,刻工图省,使得元刻本俗体字、简体字出奇地多。元代还有大量坊刻本,出于成本的考虑,多密行小字,字与字紧连,间有简体字。如元后至元五年(1339)胡氏古林书堂刻本《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》十二卷、元刻本《古今杂剧》三十卷等。

四、研究空间很大,需要充分利用

多年来对元本的研究,一直不及宋本那么全面和深入,这既是缺憾,也给我们留下继续探讨的空间。杨成凯先生评价元本,有如此高论:“对收藏家而言,元刻本是一个不乏神秘色彩的世界,随便看看好像没有多少光景,认真考究却又有许多地方尚无人迹,值得认真探索。”^②对研究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!

作者单位: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

^①叶德辉:《书林清话》卷七。

^②杨成凯:《元刻本的鉴赏与收藏》,《藏书家》第13辑。